# 宋明货币运行的空间差异及整合问题
## ——结合南、北的视角

邱永志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 昆明 650091)

**摘　要:** 从货币角度专门讨论历史上南北差异及整合问题的研究,较为缺乏。受前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统治疆域、族群之广袤多样,以及跨越时空金融技术构架缺乏等因素制约,传统中国的货币运行体制多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差异与南北分野。然而,由于统一疆域内的商贸活动、人员物资流动,加之国家推行的诸社会经济制度所具有的跨区整合特质,货币又有跨区融通、整合的内在趋势。北宋与明代为此提供了鲜明的写照和差异。北宋通过整合五代以来南北币制的分化,建立起较为统一的铜钱体制,并围绕铜钱标准打造、维持了一个跨越南北的货币—信用网络与运行系统,内在呈现着以政府主导为特色的他律性整合路径。明代通过整合元明之际南北及各地的货币差异,希望建立起统一的宝钞制度,然而宝钞由于内在制度缺失快速走向崩解,钱法也履兴难振,结果货币流通因政府失控呈现着空间分割化、南北差异化与地域自律化的趋向,其整合实际有赖于商贸发展推动的市场与金融组织的发育,内在呈现着以市场为主导的自律性整合路径。不过,整合程度在明代发展的较为有限,且地域自律性货币体制日益成为明清时期的主流。

**关键词:** 货币;南北;空间差异;整合
**中图分类号:**F 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4)06-0126-12

##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历史上南北社会经济及制度的差异、联系与整合问题多为学界所关注,①然而,专门从货币这一视角进行考察的研究成果十分之少。在笔者看来,融合货币视角,将通货问题置于王朝国家体制构建进程中予以考察,并对南北货币差异及整合问题进行一定程度涉及的学者主要有宫崎市定、檀上宽二人。宫崎市定论述了五代宋初南北币制的分化与整合,北方政权一以贯之的以铜钱为本的政策及其对南方金银、铅锡铁钱的整合,为我们揭示了宋朝确立并坚持统一铜钱政策的历史渊源。② 檀上宽则从明初政权所具有的强烈“南人政权”色彩,以及朱元璋欲将政权扩展至全国的角度论述通货问题,认为明初政权所实施的分省铜钱铸造不足以将政治权威快速扩展至北方,故转而发行可以快速投放的大明宝钞,并压制江南等地的白银流通,一定程度也呈现了明初实施单一纸钞政策的政治考量。③ 当然,论及

**收稿日期:**2024-01-20
**作者简介:**邱永志,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货币转型下明代信用发展研究”(22CZS034)。

① 近来系统梳理、检视或讨论帝制晚期南北问题的学者当推李治安。他撰写一系列文章不仅回顾了南北问题的学术源起,还集中讨论了金元明时期南北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异及整合问题。参见李治安:《中古以来南北差异的整合发展与江南的角色功用》,《文史哲》2015 年第 1 期,第 27—34 页;《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 年第 2 期等,第 59—77 页。

② 宫崎市定:《五代宋初の通货问题》,《宫崎市定全集》第 9 卷,东京:岩波书店 1992 年版,第 129—136 页。

③ 檀上宽:《初期明王朝の通貨政策》,《東洋史研究》1980 年第 39 卷第 3 期,第 527—556 页。

宋明的货币史学者如彭信威、萧清、高聪明、汪圣铎、宫泽知之、万志英、高桥弘臣等,或多或少注意到了宋明时期货币行用的统一原则和地域差异问题。① 不过,他们多是着眼于货币政策的实施与货币流通状况,而非特别关注王朝政治经济制度的内在变动及其与货币政策演变的交互关系。

事实上,受中国前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统治疆域、族群之广袤多样,以及跨越时空的金融技术构架缺乏等因素,传统时期的货币在发行投放、流通实态中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差异与区域化特征,其中,南、北地区因资源禀赋、经济条件的差异而更加分明。不过,由于统一疆域内的商贸活动、人员物资流动,加之国家推行的诸社会经济制度所具有的跨区整合特质,潜藏在空间差异的表征下,货币又具有跨区融通、整合的内在趋势。北宋和明时期的货币运行体制既为此提供了生动的案例和写照,也提供了鲜明的对照和差异。对此,学界并无特别的研究予以对照分析。本文试以北宋和明时期为例,力图做一番初步分析。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 二、宋代货币行用的南北差异及其整合

### (一)五代宋初南北币制的分化及整合

中晚唐以来,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诸种货币化财政举措的推出,铜钱的角色日益重要,尤其是其大额结算、价值储藏与财政支付职能显著提升,且上下结构不断贯通。五代时期,北方相继交替的五代政权几乎无一例外地坚持了中晚唐以来以铜钱为本的政策。典型如后唐同光二年(924)朝廷颁布的诏令:

> 帛布之币,杂以铅锡,惟是江湖之外,盗铸尤多。市肆之间,公行无畏,因是纲商挟带,舟楫往来,换易好钱,藏贮富室,实为蠹弊,须有条流。宜令京城、诸道,于坊市行使钱内,点检杂恶铅锡钱,并宜禁断。沿江州县,每有舟船到岸,严加觉察,不许将杂铅锡恶钱往来换易好钱,如有私载,并行收纳。②

为了维护铜钱的地位,后唐不断打击伪劣铅锡钱。再如清泰二年(935),朝廷谕令"御史台晓告中外,禁用铅钱,如违犯,准条流处分"。③ 与北方政权对铜钱体制的坚持相区别的是,南方诸国由于诸种原因,在经历一段时间坚持铜钱体制后,④开始主动允许并铸行铅锡铁钱与劣质铜钱。

贞明二年(915),福建地区的闽政权率先"铸铅钱,与铜钱并行",⑤开创了五代时期南方政权铸行铅钱的先河。而后,该政权"又铸大铁钱,以'开元通宝'为文",之后又铸行永隆通宝大铁钱、天德重宝大铁钱等。⑥ 以此为标志,南方诸割据政权开始动摇铜钱体制,将铁、铅钱承认为法定货币,形成兼行铅铁钱的货币格局。岭南地区的南汉政权与闽政权类似,次年也开铸铅钱。史称:"刘龚以国用不足,铸铅钱,十当铜钱一,乾和后,多聚铜钱,城内用铅,城外用铜,禁其出入,犯者抵死。俸禄非特恩不给铜钱。"⑦从中可以较为清晰看出岭南地区行用货币的情形,即城内用铅钱,城外用铜钱,两者被禁止互相出入,且官俸以铅钱支出。尽管此时南汉政权对于铅钱流通有着诸多限制,但是并未像北方政权那般完全取缔,而是将其视为合法货币流通于城内,且作为税收支付手段。此后,马楚政权也于同光三年

---

① 笔者曾对宋明时期货币的统一政策和货币分区形成、运行机制做过探讨,并回顾了学界相关研究。参见邱永志、严诗威:《宋明货币分区的形成与运行机制比较——以四川、北边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49—66 页。

② 《旧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948 页。

③ 《旧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货志》,第 1948 页。

④ 据《文献通考》记载,诸国割据者多用唐旧钱,吴越地区是"自铸铜钱,亦如唐制"。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二》,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231 页。

⑤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纪二》,贞明二年十二月戊申,北京: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8808 页。

⑥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〇《闽一·太祖世家》,北京: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1313 页。

⑦ 洪遵:《泉志》卷五《伪品下》引《十国纪年·汉史》,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111、116—117 页。

(925)铸行铅铁钱,史载:“湖南地多铅铁,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为钱。”①湖南地区由此也形成了兼用铅、铁钱的货币格局。

与岭南、福建、湖南地区相比,四川和江南地区进入行用铅铁钱的局面,相对较晚。直至五代后期,南唐和后蜀政权的铜钱体制才开始动摇,官方铸行铁钱。起初南唐坚持铜钱的态度,与北方政权类似。史载:“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臣事于周,岁时贡献,府藏空竭,钱益少,物价腾贵。礼部侍郎钟谟请铸大钱,一当五十,中书舍人韩熙载请铸铁钱;唐主始皆不从,谟陈请不已,乃从之。”②从南唐统治者对于铸行大铜钱和铁钱的最初态度可以看出,南唐政权对于动摇铜钱体制持谨慎态度。但是,官方囿于现实情况,还是采纳钟谟的建议铸行大铜钱,失败后,“韩熙载又铸铁钱,以一当二”,③其后“行铁钱,每十钱,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其后铜钱遂废,民间止用铁钱。末年,铜钱一直铁钱十”,④由此江南地区也形成了铜、铁钱兼行的货币格局。四川地区的前蜀和后蜀政权早期对于铜钱体制的维持相对较为稳妥。直至广政年间,“增铸铁钱于外郡,边界参用,每钱千分四百为铜,六百为铁。逮至末年,流入成都,率铜钱十分杂铁钱一分。大盈库往往与铜钱相混莫辨,盖铸工精也”。⑤ 也就是说,此时四川地区也未能继续坚持铜钱体制,开始承认铁钱作为合法货币流通于市场之中。

由此,南方地区中的福建、江南、四川、岭南、湖南等大部分地区,在五代时期相继形成兼用铅铁钱的格局,“西川、湖南、福建皆用铁钱,与铜钱兼行”。⑥ 对于北方而言,坚持铜钱体制,取缔铅(铁、锡)钱的流通,投放优质铜钱始终是它们遵循的逻辑。对于南方而言,囿于诸多现实因素,铜钱体制产生了明显的动摇,随之引入铅铁钱作为合法货币。南北货币政策发生明显的分化,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宋初。⑦

宫崎市定进一步指出,南北地区还存在是否行用白银的差异:“五代时期各国分裂,铜钱成为国际通用货币,各国纷纷采取重商主义方式(严格的货币管制,发行铅钱、铁钱,利用劣币导致的低兑换率,将本国商品廉价倾销他国等)吸引铜币。商人们使用白银,来规避诸国货币间的壁垒”,“相对而言,黄河地区盛行铜钱,南方地区盛行铅钱、铁钱和白银。宋代统一后,将北方币制强制推向南方。铜钱确立起全国性的基准计价手段地位,但南方用银的习惯反向影响华北,从而形成宋代独具特色的货币制度,铜钱是记账单位,民间跨区贸易和结算用白银来做汇兑手段。对外贸易中,严禁铜币支付,造成白银使用广泛,结果形成铜钱与白银双轨货币制度”⑧。

关于宋初朝廷如何建立起统一的全国性铜钱体制,并确立起小平钱作为基本的记账单位和交易媒介的过程,学界研究已十分详尽。⑨ 概括言之,宋初自太祖时期开始便采取一系列举措(收缴并严禁私铸、铅铁钱不许出本路等)来整顿南方混乱的货币秩序,并不断开铸通宝钱来统一铸币。历经反复,至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七四《后唐纪三》,同光三年十二月壬子,第 8953 页。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九四《后周纪五》,显德六年七月丙寅,第 9603 页。

③ 《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第二》,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777 页。

④ 陆游:《南唐书》卷三《后主本纪第三》,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07 页。

⑤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六七引费著《楮币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8 页下。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二》,第 232 页。

⑦ 宋初的情形是:“江南钱不得至江北”“平广南、江南,亦听权用旧钱,如川蜀法”。《宋史》卷一八〇《食货下二》,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4375、4376 页。

⑧ 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张学锋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2—33 页。当然,关于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白银究竟是大额货币还是贵重商品,学界存有争议。李埏(《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历史研究》1964 年第 1 期,第 169—190 页)、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5—79 页)认为它还是一种贵重商品。

⑨ 汪圣铎:《两宋货币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25—336 页;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3—86 页。

真宗时期,北宋大体完成了统一铜钱体制的建设。① 伴随着矿政的复苏与繁荣、商业经济日益活跃以及财政货币化程度提高等因素,北宋的铜钱流通趋于繁盛。

迄今回看,北宋铜钱流通的数量、范围和深度可能超过了中国史上的其他朝代。宋代诸种货币与轻赍品如铁钱、各类纸钞、银绢等,或需要锚定铜钱作为价值基准,或与铜钱的计价尺度相联系;各类衍生的信用票据,如盐钞、见钱钞、见钱公据等也多是以铜钱为本或重要兑换手段,实际形成了以铜钱为基准计价核心的货币体系。大规模与持续的宋钱供应甚至为环中国海域铜钱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② 可见,北宋铜钱承绪并跨越晚唐五代南北货币政策分化、南方白银广泛流通之局面,确立起基准货币和主导货币的地位,加上各类信用票据、入便制、金银绢帛等补充,形成跨越空间的整合性,强力整合着南北区域原有的差异化货币格局。

**(二)铜钱运行体制的时空特点**

北宋虽建立起全国较为统一的铜钱记账和流通体制,也铸行供应了中国史上数量最多的铜钱,③但由于不具备现代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系统所具有的信用发行机制,缺乏跨越时空约束的金融技术条件,致使宋代的铜钱实际是围绕财政系统建立起相应的发行—回笼机制。④ 因缘于财政运作深刻的时空特点,以及财政发行机制的特性,宋代铜钱的流通在总体上不可避免带有相似的时空特性。这种状况,也导致铜钱运行体制存在一系列结构性问题。⑤

与明清相区别的是,宋朝建立的铜钱运行体制存在两大较为特殊的原则和背景:一是各地钱监的铸钱实施主体直接上供京师的分配原则,加上各种赋税渠道征收的铜钱,使得京师汇聚了相当数额的铜钱量(而且,宋廷还多番限制京师铜钱通过正常商贸途径出城);二是在财政日益货币化的进程中,小额铜钱发挥着较为单一且核心的货币功能(绢帛的货币职能在消退、金银货币职能发育有限)。它是货币化财政收支中的主角,这让面额较小且搬运困难的铜钱承担了异常繁重的财政收支角色。

宋代铜钱的发行主要依托两大财政体系投放发行:一是常规性的发行投放渠道,即通过搭放官俸、军饷、赏赐、政府购买的方式向特定人群投放铜钱,这也是宋钱投放的主体;另一是特殊性的投放渠道,即利用官方信用票据为结算中介,通过票据的跨区销售和异地回购、兑现,实现铜钱的投放与跨区调拨。两种投放渠道都存在向特定地区、人群集中的倾向。原因在于,官俸、赏赐虽有“广布式”投放功效,但多集中于特定人群且数量不广;大额军饷支出主要集中于西北和京师;政府购买也多集中于西北地区和特定城镇。特殊性投放渠道也带有鲜明的地域特点,主要集中在西北—京师—东南之间。因此,宋代铜钱的财政发行—投放渠道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限定空间特征,具有集中与特定地区和人群的“线带式”投放特点。

然而,铜钱的回笼却具有全国分散“密布式”的特点,主要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赋役折纳、商税体系征收、专卖税收的征收、杂税附加的征收以及榷货务等特定机构的入中现钱等渠道来组织实施。这种状况,使得宋钱的投放因财政重心而有所集中,而征收却有全国的一致性(且多来自东南财赋重地)。由

① 关于四川特殊货币区以及北宋中叶宋廷政策诱导形成的西北特殊货币区问题,学界论述很多,此处不论。

② 井上正夫:《東アジア国際通貨と中世日本:宋銭と為替からみた経済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22 年版。

③ 据高聪明统计,北宋官方铸钱量大体在 2.6 亿贯,加上历代遗存和民间私钱,铜钱流通规模应超过 3 亿贯;另一铜钱铸行繁盛的清代,铸钱规模大体在 2.2 亿贯以上,其中,乾隆一朝铸行超过 1.67 亿贯。参见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第 103 页。赵士第:《艰难的复归:清初制钱流通的困境与重整》,《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5 期,第 180—194 页。

④ 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1 页;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第 281 页。

⑤ 该节内容参考了笔者关于北宋钱法运行的逻辑机制、时空特点及结构性问题的相关研究。本处直接概括其中的结论,特此说明之。

此,宋钱在发行投放的初始阶段便存在严重的时空上不均衡、供需不匹配特性。这些特性深度表现为:铜钱供给投放的相对集中与铜钱两类需求(纳税季节的财政性需求、日常性的交易性需求)的分散存在深刻矛盾,加上铜钱本身所具有的难以回笼的特性(搬运困难、基层民众储蓄倾向),使得铜钱的流通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一是大量铜钱集中在京师府库和官豪手中较长时间,而最需要流动性的商贾、民众面临着铜钱短缺的窘况,笔者称之为“市场性钱荒”。二是在空间上,铜钱投放主要集中于京师和北部沿边地区,形成以京师为中心,以西北和北方为两端的狭窄地带。这种“线带式”发行投放机制,与全国广泛密布的纳税需求和商贸需求存在尖锐的矛盾。故而,因为财政抽调而得不到及时回馈所造成的局部地区钱荒,可称之为“财政性钱荒”。北宋时期的市场性钱荒和财政性钱荒问题都较为严重,财政性钱荒在东南地区尤其突出。“钱荒”的背后,折射的是传统时代铜钱发行机制中存在难以调和的结构性难题。

从南北空间差异的视角看,北宋时期铜钱作为较为统一的货币虽具有跨越南北的一致性和整合性,但其发行渠道、运行机制与供需结构存在鲜明的空间差异和南北差异,即以京师开封—西北为代表的北方区域是铜钱主要的投放集中地;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作为经贸发达之地,也是铸钱最多的地方,却存在较为严重的“钱荒”,尤以财政性钱荒为典型。

**(三)跨区整合:信用机制的广泛运用**

铜钱发行机制在时空上的不均衡、供需上的不匹配,造成了铜钱流通在空间上的南北差异与非协调性,削弱了统一铜钱体制的整合性,导致各种钱荒问题层出不穷。更为关键的是,大规模行用小额铜钱作为基础货币与财政支付手段,也给宋朝带了其他挑战。原因在于,铜钱具有面额过小、搬运不便的先天特性,因此大额结算与支付不便、成规模空间转移困难,加之贩运携带铜钱往往需要缴纳过境商税,①更增加了铜钱携带搬运的成本。这些因素严重阻碍了国内商贸活动的开展与财政货币化的平稳运行。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宋廷尝试做出一系列创新举措:

其一,为了应对东南地区日趋严重的钱荒问题,宋廷逐步建立起相对灵活而分散的投放渠道。如为了缓解东南地区严重的钱荒,宋廷通过大规模的政府购买有意在此地抛售铜钱。② 如景祐二年(1035),有官员奏称,诸路岁输缗钱至京师过重,导致各地钱重货轻。于是,宋廷要求江东、福建、广东、广西四路抛售铜钱 33 万缗,换取银绢轻赍品上供。③ 庆历初年,范仲淹在奏疏中指出:“江浙诸路岁籴米六百万石,其所籴之价与辇运之费,每岁共用钱三百余万贯文。”④不过,这些抛售多只局限在少数特定的城镇地区,无法改变许多乡村地区缺钱的问题。⑤ 熙宁时期,王安石为了应对新政日趋扩大的货币需求,除了推行铸币大跃进、放开铜禁等改革措施外,还积极提高地方钱监铸钱存留地方、用于地方支出的比例,⑥推动铜钱发行投放的分散化。更值得提及的是,王安石诸多新法举措如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一定程度打破了宋朝原有的铜钱过分集中于特定地区、人群的投放传统,开始建立起遍布全国或跨越

① 关于铜钱过境需要纳税问题见李景寿:《宋代商税问题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34 页。

② 详见李晓:《北宋时期的钱荒与政府购买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82—89 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七,皇祐二年冬十月甲子条,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2761 页。

④ 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三七二,第 18 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8 页。

⑤ 如熙宁九年(1076)张方平指出:“彼穷乡荒野,下户细民,冬正节腊,荷薪刍入城市,往来数十里,得五七十钱,买葱、茹、盐、醯,老稚以为甘美,平日何尝识一钱。”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七,熙宁九年九月条,第 6789 页。

⑥ 据计算,熙宁后期宋廷将钱监铸钱直接上供京师的比例由之前的 90%以上,逐渐降为 31%,约 70%的铸钱用于本路开支,或用于购买铜料、金银上供等。毕仲衍:《〈中书备对〉辑佚》,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24—225 页。

不少地区的专门投钱散布机制,这对于铜钱建立起更加均衡的散布机制、改善货币供需矛盾有极大的助益。

其二,建立正式的汇兑制度与汇兑网络。为了运转统一的铜钱体制、规避铜钱空间转移的难题,宋廷在承继唐代“飞钱”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专营汇兑的入便制度正式化、官方化、全域化。宋廷初期不仅建立起专门的汇兑机构便钱务,其后更是将其整合至拥有大量现金、资源的榷货务体系中,利用榷货务及其分支机构体系将汇兑的网络延伸。① 不仅如此,官民上下还借助轻赍商品金银、绢帛来完成一般性的资金转移,更大额的资金转移还会利用盐茶交引、混合钞引、盐钞等专门性的兑付期票来完成,这使得宋代的汇兑网络不仅具有多层次性、立体性,实际也几近形成了跨越全境的汇兑网络。

其三,广泛采用各类信用工具,建立起以专卖资源和库存铜钱为核心的信用支用体系。综合言之,宋代的信用工具主要有三类:一是提取或兑付盐、茶、酒曲、胆矾、香药等专卖资源的有价证券,其中尤以盐、茶钞引最为重要;二是上文提及的入便票据、见钱钞、见钱公据、见钱关子这类专门用于汇兑现钱的票据;三是度牒、紫衣师号、助教贴等身份性有价证券。② 前两类票据的出纳结算多以榷货务及其分支机构为核心,构成了复合立体的信用票据行用网络,在实际运行中发挥着节省铜钱、输出信用、融通各类资源的角色。它们的支用方向虽有侧重地区,但其行用区域实际也是跨越多个地理单元。

其四,商业信用的广泛运用。宋代商业经济日趋活跃,官营资本不断介入生产、流通领域是其一大特色。为了节省资金支出,宋廷在众多行业如矿业开采、粮食物资购买、酿酒售酒、茶盐生产、运销等领域实施了广泛的赊贷政策,③企图利用商业信用凝结的关系来节省铜钱的搬运和支付。同时,大量官营信贷机构的设立如检校库、抵挡所、质库等也提供放贷,在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便是青苗法与市易法的实施以及相关专营信贷机构的推出。④ 借助这些机构,宋廷可谓在一定程度上将现钱、物资转化为生产运营资本,利用正式的信用制度来弥补金属货币结算和搬运的难题,提振农业经济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这些机构的分布也具有全域性和广泛性。

除此之外,宋廷上下还通过设置特殊货币区、维持货币分区运行、发行通行全境和局部地区的纸币等措施来应对小额铸币流通的结构性问题。这些举措,虽无法完全根治两类钱荒与货币发行传导在空间上的不均衡问题,但还是一定程度缓解了统一铜钱体制的结构性问题。同时,这些举措大大强化了铜钱的记账单位职能,使得以铜钱为基准的货币体系具有相当的跨区整合力度,这在历代王朝所构筑的货币金融体制中,是不多见的。

## 三、明代货币行用的南北差异及整合失效

### (一)明初货币行用的南北差异及整合失效

明朝建立初期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南北通货差异问题。元明之际,随着高度统一的元钞体制的崩解,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多通行白银、铜钱等物。孔齐指出,至正十六年后江南地区的货币流

---

① 关于入便的专门讨论,详见汪圣铎:《宋代的官营便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 年第 1 期,第 75—82 页;《两宋财政史》,北京: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390—394 页;等等。

② 陈保银:《宋代商业信用凭证研究》,高雄:高雄复富文图书出版社 2005 年版;缪坤和:《宋代信用票据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姜锡东:《宋代商业信用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1—59 页;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53—374;李晓:《宋代政府购买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12—438 页。

④ 关于官营信贷机构及其活动的相关研究见王文书:《宋代借贷业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9—172 页;魏天安:《宋代官营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4—263 页;等等。

通状况是“丙申(至正钞)绝不用,交易惟用铜钱耳。”①王祎也提到:“且今公私贸易若干,铜钱重不可致远,率皆挟用二金”。② 杭州地区在明初的状况是“时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③ 北方地区除了铜钱恢复流通外,民间更多是多种实物货币一起兼行,《元史·食货志》记载:“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④与宋初相似,明朝建立前后也是致力于建立统一的铜钱体制来进行跨区整合,不过受制于铜料不足,成效不大。洪武八年(1375),明廷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并逐渐转向倚重宝钞、轻视铸钱的道路,最终于洪武二十三年废罢铸钱,建立起单一的纸钞体制。⑤

檀上宽基于南北整合的角度检视了明初宝钞体制的推出与社会经济体制演化的内在关系,将明初货币体制的演化纳入朱明“南人型”政权蜕变为全国型政权的过程中考察,指出朱元璋推出一系列政策正是为了打破地域封闭性,统合南北经济差异,建立空前强硬的专制政权。明初铜钱的缺乏、江南地区盛行白银的现实使得朱元璋决意发行不兑现的纸钞,力图通过推出“国家主导型”的纸钞,先后严禁民间白银、铜钱流通来统制江南经济、打击江南富豪阶层。⑥ 可见,明朝建立之初确实希冀通过发行宝钞来整合并统一南北的货币流通,建立起王朝统一的货币秩序。

然而,大明宝钞体制具有严重的内在制度缺陷,存在无发行准备、无兑换安排、无数量约束、无制度配套等“四无”特征,并被最大程度隔绝在实物劳役型财政体系之外,多只执行单向的财政支付功能,其流通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也颇为不利,导致大明宝钞在运行 10 多年的时间后便出现严重的贬值。经过洪武后期尤其是永乐、宣德时期的“救钞”运动后,宝钞在各种因素的交错冲击下最终在市场上走向崩解。实际上,即使是在明初宝钞流通期内,各地也多出现数种通货跌出、实物货币盛行的局面。可见,明初朝廷力图建立的统一纸钞体制并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

**(二)货币行用的空间分割与南北分野**

宣正以降,随着商业经济的日益复苏与财政体制的改革,日益贬值的宝钞显然无法适应经济发展与财政运转的需求。铜钱虽在大运河一线的延伸地带恢复流通,但受制于朝廷铸钱乏力以及其他钱法措施效果有限,逐渐面临着严重的私铸泛滥问题。此一时期也是白银不断扩大规模进入贡赋领域,并为大中型商贸交易所需求的时期。

明中后叶的货币行用在空间上呈现出较大的地域差异和分割特征。从大的方面看,铜钱存在着“行钱之地”与“非行钱之地”的区别,白银也存在着“行银之地”与“非行银之地”的总体区分。具体而言,东南沿海地区和江南之地多通行白银为主,铜钱虽也一定程度存在,不过基准铜钱和计价体系不断发生变化,且不少地区的铜钱流通发生消退现象。南方其他地区则多是通行各类低成色实银与多种实

① 孔齐:《至正直记》卷一《楮币之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5 页。

② 王祎:《王忠公文集》卷一《泉货议》,杨讷编:《元史研究资料汇编》第 83 册,北京: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432 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洪武三年三月甲子,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年版,第 3632 页。以下所引明实录俱系此版本。

④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四·钞法》,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2485 页。

⑤ 邱永志:《“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2—90 页。

⑥ 檀上宽:《明朝专制支配の史的构造》,东京:汲古书院 1995 年版。

物货币。京师与华北地区(如北直隶、山东等地)主要行用铜钱,白银则相对缺乏。① 西北地区相对特殊,由于大量军队的驻守所造成的军需供应,使得明廷不得不调拨大量白银至此,后来又由于边镇将领、官员、商人等与京师的密切往来,以及开中体制、南北绢布贸易所促动的边镇—京师—江南之间的商贸联系,使得白银又呈现“回形针”式的南北对流,结果形成所谓的“南北银流”问题。② 在西北地区,重要的军事边镇和城镇多流通白银,基层社会多行用低成色银与各类实物货币。③

当时,银钱并行格局虽逐渐形成,然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和南北分野。铜钱的流通多集中于两京—大运河一线的延伸地带,时人称之为“行钱之地”,除了京师铜钱流通的质量可能稍有保证外,其他地区的铜钱多因商贸渠道的南北联通,呈现出相似的私钱化趋势,然各自行用的铜钱种类和比价关系还是存在不少差异。如京师地区,“今吴中、大江以北则兼用钱,两都亦用钱,尤便于细民”。④ 周良寅云:“京师用制钱,而不通于各省;各省有古钱,而不达于京师。用之则为钱,可以当金与币;不用,则为铜,不过铅、铁等耳,流布未广……而闽与东粤多用古钱,民便至今。”⑤山东地区则是“银、钱杂用,其钱皆用宋年号者,每二可当新钱之一”⑥淮北地区,多是流通一种叫做鹅眼的私钱。⑦ 南方的福建地区则是“福、兴、汀、邵、福、宁皆不用钱。漳、泉、延、建间用之。泉、漳所用之钱与延、建异,泉又与漳异,或以七八文,或以五六文,而各准银一分。漳郡如龙岩、漳平,亦不用钱。其同俗者龙溪诸县,而诸县所用又有美恶不齐。诏安极精,漳浦次之,龙溪则极恶,亦用之。又非时制钱,乃宋诸年号,民间盗铸传用者,而又数年一变”。⑧

除了财政征解支用以及大额商贸所形成的南北白银对流问题外,白银流通的空间差异也较为明显。南方地区广泛用银,且流通程度很深。万历时期的郝敬说:“今海内行钱,惟此地一隅。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即北地,惟民间贸易,而官帑出纳,仍用银。则钱之所行,无几耳。”⑨尤其是闽广地区,白银多被作为民间日常的交易媒介行用,史料所云“今民间皆用银,虽穷乡亦有银秤”,“闽、广绝不用钱,而用银低假”,“嘉靖初元,钱法又忽不通,以二折一,犹成化元、二时也。乃变而用银,虽穷乡下里皆然”,足

① 这个状况最为鲜明的体现便是弘治元年朝鲜人崔溥因台风漂流至中国,穿越南北所留下的记载:“江南市中用金银,江北用铜钱”。崔溥:《漂海录:中国行记》卷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99页。隆庆初,户部官员徐养正也指出类似现象:“今京城内外,凡新旧制钱皆已通行,及止直隶、山东、河南等处,见亦随便用钱。其各首地方金银、皮楮之类,日用相安。”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卷四一《钱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3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版,第1309页上栏。各地详情见邱永志:《“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第224—228页;张宁:《15—19世纪中国货币流通变革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4—90页。

② 岸本美绪:《晚明的白银北流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1期,第5—16页。

③ 邱永志、严诗威:《宋明货币分区的形成与运行机制比较——以四川、北边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2期,第49—66页。

④ 陈师:《禅寄笔谈》卷七《物考》,明万历二十一年自刻本。

⑤ 周良寅:《疏通钱法以裕经用疏》,吴亮:《万历疏钞》卷二七《钱盐类》,《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14页下栏。

⑥ 谢肇淛:《五杂组》卷一二《物部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8—259页。

⑦ 郝敬:《谏草》卷上《请行钱法疏》,台北: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1990年版,第18—19页。

⑧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备录·漳浦志》,《顾炎武全集》第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118—3119页。

⑨ 郝敬:《谏草》卷上《请行钱法疏》,第10页。

可证明。① 北方地区更多是以铜钱行用为主,兼行白银。结果,南方多银、北方多钱的货币区位差异一直困扰着明代赋役政策的展开。嘉万时期,当明廷着力扩大并将一条鞭法推行至北方地区时,出身北方的官员、士人多有反对声浪。② 这实际反映了南北货币流通的某种差异。

**(三)地域社会自我组织货币流通**

明中叶货币流通在空间上总体呈现的区块分割、南北分野特征,随着明廷推行钱法成效不大、贡赋银纳化的推进一直延续。在地域社会内部,通货多出现自我组织的状态。

在两京—大运河一线地带很早就恢复了铜钱的行用,且铜钱内部变化的节奏较为一致。正统十二年(1447),北直隶巡按周鉴发现:"滹县迤南,直抵临清、济宁、徐州、淮扬等处,军民买卖一切俱用铜钱。"③京师地区只挑拣行用永乐钱,"近京在年买卖,惟用永乐钱,其余不用"。④ 其后随着官钱成效不显,该核心行钱区主要以私钱来弥补通货不足。结果铜钱俱以相同的速率(好钱的 1/2—1/3)贬值行用。北直隶等地"近年以来,有等顽民无籍之徒,买卖高抬物价,宝钞全不通行。铜钱挑拣,巧立名色。洪武、永乐、宣德、开元、庆钱、沙版、圆眼、洗背俱称二样,下脚、新钱等项,三分折一分行使挑拣,一色、双迈、大样方准一文。"⑤可见,本地主要行用的是各色私钱,折扣比例为 1/2—1/3。京师地区也是如此,正德七年司礼监太监张永奏称:"洪武、永乐、宣德、洪治等钱暨历代旧钱……致令民间以二折一,物价腾贵。"⑥京师及江南地区出现的"板儿"钱可谓是地域自律的鲜明体现,时人记载两处的"板儿"钱在正德嘉靖之际转变为好钱的 1/2。⑦ 不独浙江、京师,苏州地区也是如此,史载本地"明朝通行历代好钱,谓之当一,用新钱谓之折二,民甚便之。正德十六年,吴中蓦然不用好钱,惟用折二"。⑧

广东出海口地带的"挂索钱"也是具有特定边界范围的地域自律性货币。它先期作为一种行钱惯例同步出现在成化初期的广东广州府、肇庆府等地,挑拣导致本地的通用钱(仿宋钱、明钱)自律性的贬值为好钱(宋钱、制钱)的 1/2。史载:"国朝天顺以前,钱法通行。成化元年、二年,忽择钱过当,以二折一,谓之"挂索",踰年乃复旧。"⑨其后,当地径直将该些通用钱称之为"挂索钱"。崇祯《肇庆府志》记载该府:"成化三年,民间行挂索钱,凡钱率以二当一。"⑩这种自律性的挂索钱一直延续至嘉隆时期。

在川、贵等地自明前中期以来就主要流通着一种叫做"茴银"的称量银币,弘治十六年(1503)御史张文指出:"云南专用海贝,四川、贵州兼用茴香银及盐、布。"⑪嘉靖《四川总志》记载:"皇明钱钞兼行,金银之用贵贱有差,蜀人旧用茴香花银并米、布贸易物货,而钱钞绝不行用。"⑫明清时期,官方多番试图通过厉行铸钱来抑制"茴银"的流通,多无成效。本地的"茴银"流通因与商贸结构、纳税需求对应而显

---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备录·漳浦志》,《顾炎武全集》第 16 册,第 3118—3119 页;谢肇淛:《五杂组》卷一二《物部四》,第 258—259 页;康熙《新修广州府志》卷九《物产》,《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40 册,第 123 页下栏。

② 葛守礼:《葛端肃公集》卷二《广铸制钱足用疏》,国图藏嘉庆七年重刻本,第 12 页;梁方仲:《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明代赋役制度》,北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18、147—153 页。

③ 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卷四一《钱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53 册,第 1303 页下栏。

④ 《明英宗实录》卷二六八,景泰七年七月甲申,第 5684—5685 页。

⑤ 戴金等:《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一三《户部类·钱钞相兼行使例》,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5 年影印本,第 343 页。

⑥ 《明武宗实录》卷八三,正德七年正月庚午,第 1804 页。

⑦ 董谷:《碧里杂存》上卷《板儿》,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58—59 页。

⑧ 高士奇:《天禄识余》卷一〇《明朝钱法》,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7 页。

⑨ 万历《新会县志》卷二《食货略》,国图藏清顺治间修补本,第 4b 页。

⑩ 崇祯《肇庆府志》卷二《郡纪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3 页。

⑪ 《明孝宗实录》卷一九七,弘治十六年三月戊子,第 3645 页。

⑫ 嘉靖《四川总志》卷一六《经略志·钱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42 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8 页。

得颇具韧性,更为重要的是,本地银匠与商人、书吏结成的操持势力实际成为“茴银”自律流通的内在机制。①

总之,明中叶以降,地域市场上的货币流通多呈现出自我组织的倾向。在地域社会内部,虽有一种主要货币占据市场,但实际上也是多种货币并行的。各种货币按照市场层次进行分层流通,多元货币逐渐形成一个复合的立体流通结构。

## 四、宋明货币运行体制与空间整合路径的比较

黑田明伸指出:“实际上的中国货币史,应是各种各样地区性本地通货的出现与王朝自上而下试图在疆域内统一币制的努力,两种力量相互抗衡博弈的过程。”②王朝国家具有统一币制的货币统合能力及其相应的制度、技术支撑,我们可称之为货币的他律;来自地域市场势力自发创造本地通货的机制,显然可以称之为货币的自律。以他律和自律的视角审视宋明货币运行体制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巨大差异。

在宋代,因缘于唐宋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以及军事财政的促动,宋廷官方显然具有更为强大的货币发行和统合能力为其财政征调系统服务。③ 北宋供应了数量惊人的铜钱并建立起较为统一的铜钱基准体系,南宋维持数种信用纸币及多个特殊货币区的行用格局等便是具体体现。更为重要的是,从整体上看,立足于以铜钱为基准的价格体系,两宋借助多样化的专卖钞引(有价证券,背后是专卖性行业及产品)、见钱公据、入便制、金银等(具有汇兑功能的汇票、财富手段),依托遍布全国且点状分布的多层级专卖性金融机构如榷货务、都茶场等,巧妙借助商人大宗商贸活动的场合与走向,编织了一张遍布境内的官营货币—信用网络,实际支持着他律性货币铜钱与纸币的运行与价值实现。④ 概言之,宋廷强大的货币供用能力,与其直接经营的官方汇兑系统(入便制、见钱钞等)、信用工具系统、有价证券系统等金融技术构架支撑是离不开的。这个技术构架与制度支撑,使得宋代官方铸钱与信用纸币不仅具有极强的跨区整合能力,也在地域社会内部成为记账标准和流通媒介,宋廷为此获得相当的货币化财政收益和发行利益。故我们可以将宋代货币体制的内在运行特点称之为“他律整合自律”的时代。⑤

宋朝建立的以他律为主要特征的货币体制,实际提供了一个相对具有成效的法定货币体制,铜钱成为较为统一而整合的基础记账货币,后来的纸币也具有跨区流通的支付效用和特点。当然,如前所述,宋代铜钱的铸造、发行—投放、传导、回笼具有自身的运作逻辑,其主要是依托财政系统搭建发行回笼机制,集中而非均衡的“线带”式发行投放、分散与“密布式”的铜钱需求和纳税回笼机制酿成了空间流通上的结构性问题与供需不匹配弊病。为了应对铜钱发行—投放—回笼所具有的时空不均衡、供需不匹配问题,宋廷实际确立起一条以政府经济活动为主导特点的跨区整合路径,即通过灵活的政府购买来散布铜钱、降低铸钱上供规模,广泛运用官营信用制度、信用工具与信用手段,建立并维持多种信用纸币制度与货币分区制度等措施来弥合铜钱跨越时空的不足。这些举措,无不显现宋廷浓厚的身影。商人势

---

① 雍正《四川通志》卷 15 下《钱法》,国图藏雍正刻本,第 1b-2a 页。

② 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第 87 页。

③ 如宫泽知之将宋廷构筑的铜钱价格体系视作全国性财政物流的组织基础,可以作为很好的证明。宫泽知之:《宋代中国の国家と経済——财政・市场・货币》,东京:創文社 1998 年版。

④ 王申通过将北宋西北地区、南宋广阔地区的信用纸币—信用工具—专卖钞引体系联动起来考察,一定程度揭示了该体系的某些轮廓。王申:《纸币与南宋国家财政——以东南会子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 年。

⑤ 宋代并非全然没有地区性本地通货的创造,如南宋因小额货币不足也曾出现钱牌等代用币,还出现过“砂毛钱”这类流通范围较广的私钱,以及私交子、私会子等信用纸币。但特征鲜明的地域分布较广的自律货币似乎未曾见到。

力和民间金融组织虽也发挥着一定的传导及整合作用,但宋廷对其经营跨区汇兑活动多持反对立场,一定程度限制了民间货币组织的发育。①

与之相对,明代是他律性货币体制坍塌,比较彻底地转向地域自律性货币体制为主的时代。首先,明廷没有搭建起依托专卖系统的金融网络与制度构件,因此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法定货币制度和记账标准。随着钞法推行的失败与钱法推行成效有限,国家货币制度长期处于缺失状态。其次,明廷自前期以降运作了一套较为全面的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全然摒弃了宋代财政征调中的那套货币—信用网络体系,使得明代财政体系的白银、铜钱和盐钞陷入孤立且难以融通的状态。更为重要的是,明后期逐渐成型的以白银为记账基准的货币化财政体制,并未有效改变这一局面。而且,财政体系之外的称量白银本身与铜钱一样,也是极具地域自律运行色彩的货币。② 就此而言,宋明货币体制的转变无疑是巨大的。

明代以地域自律为主要特征的货币体制,使得货币行用在地域空间上的差异明显。首先,全国的货币区位版图中不仅存在行钱之地、不行钱之地与行银之地、不行银之地的总体差异,而且各大货币板块也多是呈现着分割化、条块化的货币流通状态。白银、铜钱在总体上也存在着鲜明的地域差异和地方特色,使得明中叶的货币运行总体显现出相当的离散特征。其次,在各个地域货币区内部,因商贸结构、纳税需求与商人势力操持等因素,多种货币更多地是以自律的状态分层行用。其中,地域社会内部影响较大的一种货币往往具有一定的区域整合能力。不仅如此,来自官方的经济制度力量也在一定程度推动着货币的整合。如明廷通过财政收支的统计银两化一定程度整合着地方行银的计量标准,使得纹银和足银标准成为各地的计量基准,③不过这种整合的力度实际较为有限,各地还是行用着各类实银。嘉万时期明廷通过铸行制钱,也曾一度改变某些"行钱之地"的基准钱标准,但该局面也并不稳固。④ 结果,明晚期以降货币行用空间差异的整合实际有赖市场机制的深化来推动,即通过市场与金融组织的深度孕育来完成区域银两标准的相对统一,如晚清各区域的虚银两制。⑤ 只不过,这个过程在明代表现地还不明显。而且,地域自律性货币体制实际日益成为明清时期的主流。

## 结　语

综上所述,空间因素既深刻影响并制约着传统中国货币流通体制的展开,事实上也构成了传统时期货币发行流通的内在特征。如何跨越广阔的空间差异与南北分野,建立起相对统一并有成效的货币流通体制,进而为内部更具效率的财政运作与商贸活动提供可靠的基石,实际构成了大一统王朝国家治理的重要命题。具有货币整合特点的北宋与具有货币离散特点的明代为我们提供了鲜明的写照和对照。

---

① 据目前史料,宋代参与货币兑换、传导的金融组织有限,大城市主要是有交引铺、金银铺、彩帛铺等兼营,地方城镇可能存在卓铺(主要见于南宋)、质库、典当铺等积蓄或兑换铜钱,但更多时候是由商人携带、换易、经营来传导铜钱。关于宋廷限制民间汇兑的记载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 2《禁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316 页。

② 明代至清中期,民间市场上的白银行用多以诸种实体银两为主,除川贵地区的"茴银"外,各地流通的白银称呼和标准大多不一。如徽州一地银的名目就有很多种如白银、花银、梅花银、首饰花银、八成花银;后来还有柳银、狮头银、白头银、青笑银等不一而足。张宁:《15—19 世纪中国货币流通变革研究》,第 70 页;张应俞:《杜骗新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90—200 页。

③ 邱永志、张国坤:《价值基准的深化与离散:再论明清以降的虚银两制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 期,第 124—137 页。

④ 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第 113—117 页。

⑤ 典型如燕红忠等人关于营口过炉银、天津行化银、汉口洋例银、福州台伏票、归化城谱拨制等相关研究成果。参见王昉、燕红忠、高宇:《晚清区域货币市场发展研究——以营口"过炉银"为中心》,《历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97—112 页;张国坤:《近代归化城谱拨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2 期,第 218—232 页等。

北宋国家通过整合五代以来南北币制的分化,建立起较为统一的铜钱体制,并围绕着铜钱标准打造、维持了一个跨越南北的货币—信用网络与运行系统,内在呈现着以政府主导为特色的他律性整合路径。明代国家通过整合元明之际南北及各地的货币差异,希望建立起统一的宝钞制度,然而宝钞由于内在制度缺失快速走向崩解,钱法也履兴难振,结果货币流通因政府失控呈现着空间分割化、南北差异化与地域自律化的趋向,其整合实际有赖于商贸发展推动的市场与金融组织的发育,内在呈现着以市场为主导的自律性整合路径。不过,这种整合特性在明代发展的较为有限,且地域自律性货币体制日益成为明清时期的主流。

#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of Currency Operation and the Concerning Integration Issu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 Perspective from North and South China

Qiu Yongzhi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iv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relatively few studies that specifically discuss histor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China, and the concerning integration issues from the monetary perspective. Restrained by such factors as the conditions of the pre-moder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iversty of ruled territories and ethnic groups, and the lack of a financial-technical framework across time and spac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onetary operation system often presented certain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division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China. However, currency also had an inherent trend of trans-regional circulation and integration, which was attributed to the commercial and trade activities, and personnel and material flows within the unified territory, as well as to the trans-regional integ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cio-economic systems implemented by the state. As to this difference and integration, the Norther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provided a distinct portrayal and contrast.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stablished a relatively unified system of copper coins by integrat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menetary systems since the Five Dynasties. It built up and maintained a currency-credit network and operating system across North and South China around the criteria of copper coins, presenting a heteronomous integration path characterized by government predominance. The Ming Dynasty aimed to establish a unified system of paper money (宝钞) by integrating the currency difference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China, and between various regions during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an internal institution, the system of paper money quickly went to collapse, and the currency system also struggled to thrive but found it difficult to survive. As a result of the government's loss of control, the circulation of currency showed a trend of spatial segmentation, north-south differentiation, and regional autonomy. This integration actually depended on the growth of the market and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driven by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and trade, internally presenting an autonomic integration path dominated by the market. However,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was limi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also, the regional autonomic monetary system gradually became the mainstream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currency; north and south; spatial difference;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　管　琴)